

日本要收“单身税”纯属捕风捉影

日前,一条日本考虑征收“单身税”的新闻吸引了众多眼球,单身人士尤其对此愤愤不平。然而,这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日本征收“单身税”,八字还没一撇。

首先,这条新闻的原始出处是日本的《北国新闻》,这家地方报社总部位于日本石川县,并非日本主流大报。《北国新闻》的这则报道网上可查询到的发布日期是8月30日,标题为《河北省妈妈科“单身税”提案 与财务省预算官员恳谈》。河北省是石川县一个约3万人的小城镇。

按原报道说法,创设“单身税”是8月29日,由7名30至40岁育儿女性组成的“河北省妈妈科”与日本财务省一名科长级预算官员阿久泽孝会谈时提出的。特别要指出的是,妈妈科并非政

府部门科室。

报道称,妈妈科成员表达了创设“单身税”和削减医疗费用的想法。“对于‘结婚育儿后生活水准下降,能否让单身者负担一些’的提问,阿久泽孝说,确有‘单身税’的议论,但并无进展……”

从这篇报道可看出,所谓日本考虑征收“单身税”纯属以讹传讹。一个3万人口小镇的一次官民交流会上,一些育儿妈妈的个人想法,上升到日本要征收“单身税”的高度,显然不符合事实。

实际上,产生于新媒体时代的这篇报道因有标题党嫌疑,在日本国内同样引来大量批评抗议之声。

日本河北市政府随后澄清称,“虽然那样的发言是事实,但绝不到‘提案单身税’的程度”。河北市政府在官网

发表声明称:“作为河北省以及市行政全体,并没有向国家提‘单身税’提案,今后也完全没有计划提案。课税以外,作为市政府也无意对单身者提出特别负担。”

尽管《北国新闻》的报道有点捕风捉影,但日本政府试图鼓励民众结婚生育,以摆脱少子化泥潭却是不争的事实。

最新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一日本男性50岁前从未结过婚,约七分之一女性亦是如此,未来日本将进入“超单身社会”,也被称为“独身大国”。另外一个数据显示,2016年日本新生儿人口不足100万人,出生人口低于死亡人口,日本社会的高龄化、少子化趋势日趋严峻。

伴随经济环境恶化而来的收入下

滑是导致很多人不想和不能结婚的重要原因,尤其是男性收入下降,导致很多男性无力结婚。

据了解,日本有关“单身税”的话题最早出现在2004年,当时自民党内一个名为“育儿小委员会”的机构中,曾有人提出对单身者征税,但最后不了了之。

综合来看,日本国内眼下反对征收“单身税”的理由很多,如侵害婚姻自由,可能增加假结婚现象,让低收入者更难结婚等。实际上,日本对已婚人士已有一定的税收优惠,如果已婚人士没有工作或年收入低于103万日元(约6万元人民币),其配偶在缴税时就能获得一定减免。甚至有人认为,对已婚者的税收优惠政策就是一种变相的“单身税”。

据新华社报道

为了“逼婚” 这些国家操碎了心

本月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韩国首尔举办的一场经济论坛上说,中国、日本、韩国和泰国等亚洲重要经济体的人口老龄结构使当地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她敦促相关国家通过改变人口结构、增加女性劳动力等举措,刺激经济增长。

据了解,亚洲人口老龄化速度惊人。预计日本将成为亚洲首个“超高龄”国家,而到2030年,五分之一的韩国人将跨入65岁。

巧合的是,日前一则日本考虑征收“单身税”的新闻也引发不少关注。据记者了解,尽管开征“单身税”八字还没一撇,但实际上,日本早就存在减免已婚人士税负的举措,即便没有明文规定的“单身税”,变相收税以鼓励婚育的政策也早就存在。

除税收政策外,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也为“逼婚”操碎了心。

政府当“月老”

在鼓励“脱单”方面,新加坡和日本政府均想方设法为单身男女牵线搭桥。

实际上,晚婚并非新加坡社会的新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就开始出现“剩女现象”。1983年,只有38%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嫁给同等学历的男性。为解决高学历女性的未婚问题,时任总理李光耀推动设立了社交发展署,并亲自指派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医生范官娇来主持工作。

社交发展署于1984年1月成立,通过组织各种形式活动,为大学毕业生创造联谊机会。1985年,新加坡政府还成立社会发展服务部作为前者的补充,为更多非大学毕业的年轻男女创造联谊机会。2009年,上述

两家机构合并为社会发展网络。

如今,社会发展网络不仅积极通过网络系统宣介各种相亲联谊活动,还主办了一本专门教年轻人如何打扮、如何为约会做准备的杂志《二重奏》。今年2月至3月,社会发展网络主办了一次大型主题联谊活动,为新加坡单身男女举办兴趣小组和派对等200多场活动。

日本各地政府也想尽办法撮合单身人士结婚。除民间各种婚姻中介机构以外,2015年,日本政府首次将“结婚支援”作为重点工作措施列入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将以往的少子化对策重点从育儿援助转向“结婚支援”。日本各地方政府也成立“结婚支援中心”和“年轻人交流信息网站”等平台,同民间机构一起搭建鹊桥。

生娃给重奖

近年来,韩国生育率不断下降。面对严峻的人口危机,韩国政府从2006年起开始制定解决生育率低的五年计划。

有韩国媒体统计,十多年来,韩国政府在应对人口危机上投入近126万亿韩元(约合7245亿元人民币),将主要财政预算投在了保育教育费、减少新婚夫妻住宅负担、削减大学学费和改善育儿产假制度等方面。然而,如此大规模的金额投入收效并不明显。

由于韩国农村地区人口急剧减少、劳动力严重不足,韩国各地政府为鼓励民众生育展开奖励金大战,不惜重金求子。

据了解,韩国农村地区奖金最高的是京畿道杨坪郡,生二胎奖励300万韩元(1.7万元人民币),三胎500万韩元(2.9万元人民币),四胎700万韩元(4万元人民币),五胎1000万

韩元(5.8万元人民币),六胎2000万韩元(11.5万元人民币)。一些韩国媒体甚至称,现在不少韩国夫妇会根据各地奖励金额来判断去哪生娃。

此外,杨坪郡为鼓励生育还出台多种优惠政策,如对多子女家庭实行停车费半价优惠、医疗费减免、补习班和美容室优惠等,因其表现突出,还曾获得韩国总统表彰。

日本政府在鼓励育儿方面也出台了生育补贴、儿童补贴和低收入家庭学生就学援助等政策,但在国家财政吃紧的情况下,这些政策似乎有些杯水车薪。

为鼓励民众生育,新加坡政府多年来采取了减税、发放婴儿花红(奖金)、为儿童发展户头存钱、医疗费用

减免、延长女性有薪产假并为父亲提供法定有薪陪产假等多项措施。2015年新加坡建国50周年之际,新加坡政府给当年生育的夫妇发放了两万份“金禧宝宝礼盒”。

新加坡领导人也常在多个场合谈及生育问题。在2017年新年献词中,总理李显龙表示政府正尽全力帮助年轻夫妇抚育孩子,包括增加学前教育 and 托儿服务名额、设立更多新加坡人负担得起的幼儿园,以及缩短新组屋等候时间等。

李显龙当时说:“我希望新的一年会迎来更多新生宝宝,听到更多鸡宝宝响亮的啼哭声,为新加坡这个大家庭增添更多欢乐!”

据新华社报道

